

## 階級・族裔・再現 析論卜婁杉的《美國在我心》\*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E-Mail: thshan@sinica.edu.tw

### 摘要

本文旨在從階級與族裔的角度，探討菲美作家卜婁杉於《美國在我心》中的再現策略與重要議題。全文分為六節：第一節描述卜婁杉集被殖民者、弱勢族裔、農民、工人、作家、編輯、知識分子、工運人士等多重角色於一身之獨特現象及其意義；第二節討論主角階級意識的覺醒，指出貫穿全書的是階級的議題；第三節分析階級如何與族裔結合，形成「被殖民的階級片段」；第四節揭示主角如何內化主流價值觀，並以之反擊主流社會的不公不義；第五節剖析主角所扮演的作家與知識分子的角色；第六節指出文學如何藉由再現帶來希望與再生。

**關鍵詞：**卜婁杉、《美國在我心》、階級、族裔、亞美文學

---

投稿日期：92.9.24；接受刊登日期：93.6.10；最後修訂日期：94.4.27

責任校對：范馨文、陳雪美、林中秀

\* 本文初稿宣讀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舉辦之「階級與美國文學：第八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筆者利用國科會移地研究之便，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族裔研究圖書館 (Ethnic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進行研究，並由陳雪美小姐協助蒐集資料及修潤文字，謹此致謝。此外，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筆者在文中均予以回應或補充資料。

農民不知道該向誰陳述自己的冤屈，  
也不知道剝削之痛忍無可忍時，該向誰抗爭。  
——《美國在我心》

……我覺得像是罪犯，逃離自己沒有犯下的罪行。  
而那項罪行就是：我是在美國的非律賓人。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書信

人生是集體的工作，社會現實也是。  
因此，作家必須加入其他人的鬥爭，  
以保護、照亮、完成人生。  
否則，他就一無所有——什麼也不是。  
——〈身為工人的作家〉

## 壹、卜婁杉的多重角色與意義

在亞美文藝中，菲美作家卜婁杉 (Carlos Bulosan, 1911-1956)<sup>1</sup> 和他的作品占有獨特的地位。首先，在西美戰爭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1898) 中，美國打敗西班牙，菲律賓脫離西班牙的統治，隨後經過三年的菲美戰爭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1899-1902)，終於不敵強大的外來勢力，淪為美國的殖民地，菲律賓人則成為美國僑民 (American nationals)，一直到一九四六年菲律賓獨立為止。<sup>2</sup> 這使得美國與菲律賓在歷史、法律與國際政治上存

<sup>1</sup> 卜婁杉的生前好友摩蘭特 (P. C. Morante) 在有關他的傳記中指出，根據作者本人的陳述及文字資料，他的生年有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兩種說法。摩蘭特並說，相差一年其實無關緊要 (1984: 32)。然而伊凡吉麗絲塔 (Susan Evangelista) 根據卜婁杉受洗的紀錄和他妹妹的說法，認為他生於一九一一年 (1985: 64)。以研究與編輯卜婁杉作品聞名的聖·璜 (E. San Juan, Jr.) 早年接受一九一三年的說法，但在九九〇年代轉而接受一九一一年的說法 (1993: 142; 1995: 3; 1996: 131)。

<sup>2</sup> 卜婁杉的力作《美國在我心》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初版於一九四三年 (一說一

在著殖民／被殖民的關係，迥異於美國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其次，卜婁杉在其代表作《美國在我心》中寫道，自己出身菲律賓農民階級，家境清寒，屢遭壓迫，特別感受到困苦窮乏與社會不公。後來爲了生計，離開故土，前去嚮往已久的美國，追尋「美國夢」，卻依然侷促於貧窮的工人階級，飽受各種剝削與歧視，對於階級與種族的苦難尤其深感切膚之痛。他將這些親身體驗發爲文字，《美國在我心》遂成爲亞美文藝中兼具文學藝術、社會意義、政治見地與歷史價值的罕見之作。第三，雖然當時菲律賓人已爲美國僑民，可以自由進出美國，卻無權成爲「歸化的美國公民」(“naturalized American citizens”) (Bulosan, 1943/1973: 269)，在徵兵法案上也被列爲「外人」(“aliens”)，若非二次大戰時羅斯福總統鑑於國家需要，簽署法令，否則即使菲律賓人有心參軍、報效宗主國，也不得其門而入 (1943/1973: 318-319)。卜婁杉終其一生未成爲美國公民 (McWilliams, 1973: xv)，<sup>3</sup> 反倒因爲族裔的因素，連同其他亞裔一樣被美國白人主流社會視爲「非我族類」的異己，遭到個別的、結構性的種族歧視，甚至暴力威脅生命。第四，卜婁杉因爲罹患肺疾，不便勞力工作，因此得以博覽群籍，並將個人、家庭與族裔的特殊經驗筆之於書，舉凡詩歌、散文、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戲劇、書信、新聞報導等文類無所不包，在美國和菲律賓兩地，或於報章雜誌發表，或出版爲書，甚至在美國主流社會中都擁有相當廣泛的讀者群。<sup>4</sup> 最後，卜婁杉最特殊的大抵就是因爲有感於階級壓迫、種

---

九四六年)，無論如何，他撰寫此書時菲律賓仍爲美國殖民地。

<sup>3</sup> 卜婁杉在一九五五年(逝世前一年)四月八日的書信中提到，自己從未申請爲美國公民，而且雖然很想造訪菲律賓，但懷疑投身工運的他能不能返回美國 (Bulosan, 1960: 85)，以致終生未能重回故鄉。

<sup>4</sup> 如他的短篇小說自一九四二年起刊登於《紐約客》(New Yorker)，三年間就刊出了六篇。這些作品多以幽默、諷刺的筆調寫出市井小民的處境／困境。他於一九四四

族歧視與社會不公，於是以文字為工具，親身經驗為素材——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在我心》的副標題為《一部個人的歷史》(*A Personal History*)<sup>5</sup>——不但寫成文學作品，還與志同道合的人士編輯並發行刊物，籌組工會，以具體作為投入社會運動，為族群爭取權利，伸張正義。<sup>6</sup>

總之，卜婁杉集被殖民者、農民、工人、被剝削者、族裔人士、見證人、記錄者、行動分子、工運人士、作家、編輯、知識分子……多重角色於一身，以觀察者／參與者 (observer/participant)、「勇敢的見證者」／「在多重戰線中身經百戰的主角」(San Juan, 1998: 128) 的發言位置，運用各種寫作方式，積極、批判地介入自身所處的惡劣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在短短四十五年的人生歷程中，以筆為劍，為建立一個更公正、美好的未來而奮鬥不懈。他不但是 一九四〇年代最耀眼的菲裔美國作家，而且放眼全亞美作家，具有如此多重角色並積極投入社會運動的人可謂鳳毛麟角。<sup>7</sup> 這一切尤

---

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父親的笑聲》(*The Laughter of My Father*) 成為暢銷書，《美國在我心》的不同譯本在瑞典、丹麥、義大利、南斯拉夫流通，《瞭望》(*Look*) 雜誌更票選此書為五十本最重要的書之一 (Libretti, 2001: 22)。有關他的著作，詳見索柏格 (Solberg, 1979) 編輯的書目。

<sup>5</sup> 卜婁杉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的書信中，對此書有如下的說法：「這本書之所以重要，在於它首次揭露了我們在美國和 [菲律賓] 群島的困境」(Bulosan, 1960: 57)。

<sup>6</sup> 就筆者寓目的資料中，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新潮》(*The New Tide*) 創刊號、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美國合唱：六位菲律賓詩人》(*Chorus for America: Six Philippine Poets*) 和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國際碼頭工人和倉庫工人工會三十七支部罐頭工人一九五二年年鑑》(*1952 Yearbook, Cannery Workers, ILWU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 Warehousemen's Union] Local 37*) 都由卜婁杉擔任編輯。在年鑑結尾，卜婁杉以編輯的身分署名提出自己的工運信念 (21)，與《美國在我心》一書中的訴求相互印證。

<sup>7</sup> 在一九五〇年代參加錫主義 (McCarthyism) 雷厲風行時，他是美國聯邦調查局黑名單上的顛覆分子。當文壇與學界盛行美學主義 (Aestheticism) 時，他的作品遭到貶抑，「一直到六〇年代末期，才被菲律賓移民和他們在美國的激進子女重新發現」(San Juan, 1978: vi)，而華盛頓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有鑑於

可見於卜婁杉的自傳性作品《美國在我心》中，裡面特別傳達了第一代菲裔美國移民工人（也就是所謂的「皮諾依」[Pinoy]）的個人與集體經驗。<sup>8</sup> 以往對亞美文獻的研究多集中於華美文獻與日美文獻，而國內有關菲美文獻的研究更是絕無僅有。<sup>9</sup> 本文旨在透過閱讀這部菲美／亞美文獻經典之作，討論其中的階級與族裔如何交相運作，銘刻於此一獨具特色的文本中，再現了自美國經濟大恐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美國西岸和阿拉斯加的菲律賓工人階級

---

「族裔研究學者指陳卜婁杉的市場性以及菲律賓和美國團體積極反對『美國—馬可仕獨裁統治』」(San Juan, 1993: 153)，在一九七三年重新印行《美國在我心》，這時距離初版已整整三十年。

<sup>8</sup> 對弱勢族裔而言，個人與集體息息相關，在美國的菲律賓人也不例外。卜婁杉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的書信中提到要寫有關兄弟三人的事，因為「我相信我們三人過去和現在都過著悲慘的生活。我有責任去詮釋這個。這也是每一個在美國的菲律賓人的生活」(Bulosan, 1960: 9)。因此，《美國在我心》中的主角覺得個人的尊嚴 (personal pride) 受到傷害時 (286)，馬上說道：「菲律賓人是以民族的方式 (in national terms) 在工作和生活，所以當他們受到中傷時，就認為整個種族 (their whole race) 都受到中傷」(287)。因此，當他表達個人經驗與記憶時，往往也是在表達集體的經驗與記憶。

<sup>9</sup> 有關菲美文獻的綜觀，較早的見於一九七四年裴那蘭達 (Oscar Penaranda) 等人為素有亞美文獻里程碑之稱的《唉！亞美作家選集》(Aiii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所撰寫的〈菲美文獻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Filipino-American Literature”)，而後索柏格也為一九八三年版的《唉！》另撰〈菲美文獻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Filipino American Literature”)。較晚近的可參閱一九九二年坎波馬內斯 (Oscar V. Campomanes) 的〈在美國的菲律賓人與他們的流亡文學〉(“Filipino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Literature of Exile”)，以及一九九七年龔薩雷茲 (N. V. M. Gonzalez) 和坎波馬內斯合寫的〈菲美文獻〉(“Filipino American Literature”)。索柏格在該文中指出，與其他亞美文獻相較，菲美文獻的特色在於「與菲律賓本土的英文寫作密不可分」(1983: 50)。坎波馬內斯則在一九九二年的文章中提到，以往亞美文獻多集中於華美與日美文獻中的移民與定居，以致無形中排除了其他主題 (72)。有關台灣的亞美文獻研究概況，可參閱筆者 (2001) 及馮品佳 (2002，尤其頁 9-11)。

的遭遇及反抗。<sup>10</sup>

## 貳、階級意識的覺醒

《美國在我心》分爲四部。第一部描寫主角<sup>11</sup> 在菲律賓的童年、家庭、故鄉、農村、教育與失學、貧困與剝削的情況，以及赴美的決定；第二部敘述赴美之後所歷經的種種迫害，如何遭到剝

<sup>10</sup> 卜婁杉主要以《美國在我心》奠定他在菲美／亞美文學中的地位。雖然他的若干作品曾風行一時，但後來逐漸湮沒。因此，早期有關他的研究多著重於歷史和作品之資料與蒐集，這點可見於他人的傳記性論述以及爲他編選的小說、詩歌、散文、書信和日記選集，其中以聖·璜的貢獻尤爲突出。《亞美期刊》(Amerasia Journal) 於一九七九年五月推出的卜婁杉專號(第6卷第1期)，蒐集了相關作品、研究、訪談、書目資料於一身，更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相關資料詳見本文之「參考文獻」。至於有關此書之研究與教學概況，可參閱楚都(Lawrence J. Trudeau)一九九九年編輯的《亞美文學：亞裔美國作家作品之評論》(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Reviews and Criticism of Works by American Writers of Asian Descent)，頁1-16以及李布雷提(Tim Libretti)二〇〇一年的專文〈卜婁杉的《美國在我心》〉(“America Is in the Heart by Carlos Bulosan”)。本文則在這些基礎上結合文本分析與文化政治，進行解讀，尤其著重於從階級與作家—知識分子的角度切入。

<sup>11</sup> 主角隨著不同的情境而使用三個不同的名字：菲律賓名字阿攸斯(Allos)主要用於親人之間；在美國最常用的是卡洛斯(Carlos)，由於這正是卜婁杉之名，更增添了自傳的色彩；另一個較少使用的則是卡爾(Carl)——他在自己主編的《新潮》創刊號中，也以“Carl Bulosan”之名發表詩作。由於這部自傳小說中主角／敘事者的故事並不全然符合卜婁杉的家世和生平——好友摩蘭特在有關他的傳記中指出，此書「其實有百分之三十是自傳，百分之四十是美國的皮諾依生活的個案史，百分之三十是小說」(Morante, 1984: 31)，其他人也提到不符之處(Evangelista, 1980: 243)或「敘事者—主角更像是根據自傳、家族史和典型的皮諾依經驗而來的綜合角色」(Campomanes & Gernes, 1988: 17)。阿奇左拉(Marilyn Alquizola)在兩篇論文中也強調這一點(1989, 1991)。金惠經(Elaine H. Kim)說：此書「與個人歷史相較，既有過之，也有不及(both less and more than a personal history)：它是菲美社群的綜合畫像，也是從參與那個經驗者的角度的社會文件(social document)」(1982: 48)。為了避免混淆作者和書中人物(此人且有三個不同名字)，本文統稱爲主角。

削，顛沛流離，卻又在失望與幻滅中找到希望與新生；第三部描寫如何與志同道合的夥伴籌組工會，出版刊物，接二連三的恐懼 (fear)、逃亡 (flight) 與反擊 (fightback)，後來因病入院，得以藉此機會博覽群籍，建立文學觀，開始寫詩；第四部則進一步投入寫作，從事社會運動及啓蒙工作，二次大戰爆發，兩位兄長終於有資格參軍，為美國效力，全書以重申對美國的信念作結。

此書一向被視為菲美文學／亞美文學的經典之作，然而綜觀全書，我們不得不承認：族裔的因素固然占有舉足輕重的分量，但真正貫穿全書的卻是階級的議題。質言之，全書自第二部主角來到美國之後，開啓種族歧視的議題，並且到全書終了一直與階級的因素密切結合，然而階級卻早在第一部描述菲律賓農民悲慘、困頓的處境時便已昭然若揭。

就亞洲讀者而言，第一部所描寫的非律賓鄉間生活、民俗、農事與耕作，確實讓人感覺相當熟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農民的純樸、勤勞，然而辛苦耕耘的農民未必能擁有自己的土地，不僅收入微薄，還處處仰人鼻息。相反的，教會可以不事生產 (22)，地主可以遠居城市 (即 “absentee landlords”) (23)，卻坐收農民勞力所得，極盡剝削之能事。而專業階級 (the professional classes) 送兒子去學法律，將來擔任律師、競選公職，進而魚肉鄉里、剝削農民，製造出「無產農民的新階級」(“a new class of dispossessed peasants”) (24)。

作者藉由描述家庭的困境，生動地呈現出整個體制的三公不義，其中最動人的兩段分述主角親眼目睹父母的遭遇。為了送三哥馬卡里歐 (Marcario) 上學並支應他的過度需索，「老實、單純的」(23) 父親先賣了一畝地，後來又典當了一畝，由於僅剩的一畝無法維持全家生計 (最後連這畝地也不得不變賣)，便向教會商借得一塊荒廢多年的土地中的五畝 (14-15)，口頭約定父親種的任何作物，

前兩年教會可得到收成的三分之一，從第三年起雙方平分 (22)。即使如此，在開墾了十五個月，正期盼有好收成之際，這塊土地卻轉手給一位遠在馬尼拉的富豪，並由其代理人出面要走 (27)。爲了索回土地，父親步行到五十公里外的省城，待了三個星期，鎩羽而歸，赤著雙足流血走回。回來之後，「四處央求農夫們借他一些地耕種」(28)。在好不容易分期快將典當的土地贖回時，卻因差了一百披索 (pesos)，連土地帶上面種的稻子都拱手讓給金主。父親只能說：「當一個人能把屬於你和家人的東西拿走時，我們的國家就有問題」(55)。這些事件生動地呈現了農民的困境，即使他們費盡勞力，也抵不過教會、地主、富豪、專業階級在社會上的結構性優勢，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辛苦耕耘的土地和收成落入不事生產的人手中。

如果說父親的遭遇顯示了與富人階級的衝突，那麼母親的遭遇則讓主角了解到中產階級的態度。勤儉、寬厚的母親爲了貼補家用，與主角在各村落兜售鹹魚，以物易物，換取米、豆、雞、蛋等，儘管如此，仁慈的母親還是讓更窮的人賒帳。有次母親盯視一位由兩個僕人隨侍的漂亮女子，冷不防此人來到面前，語帶輕蔑地質問：「窮女人，你看什麼？」並以手中的小絲傘敲翻她盛豆的籃子，揚長而去。母親一邊跪爬在地上撿豆子，口中還忙不迭地說：「沒關係，沒關係」(38)。這件事對主角是「另一個發現：我與菲律賓中產階級的第一次衝突。後來我知道了他們的社會態度，他們在農民問題上的立場。我知道了他們對於國計民生的立場。我痛恨他們對於農民的傲慢與輕蔑」(38)。母子二人辛苦兜售回來的途中，母親有兩次落水，卻不顧自己安危，死命要保住換來的物品，甚至上岸後又衝入水中，載浮載沈，只爲救回裝鹹魚的罐子或盛豆子的籃子，讀來令人心酸 (34, 39)。這些都強化了主角的階級意識和反抗的決心：「我這個農民不會跪爬在地上，口裡還說：『沒關係，沒



關係』」(38)。

實際從事生產的農民不能擁有自己的土地，掙扎於飢餓的邊緣，而遠在城市的地主可能根本未曾見過自己的土地，卻坐享他人勞動的成果，不公不義莫此為甚。就是這些切身經驗，使得原本童駭無知的主角逐漸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了解身為農民與其他階級不同。親身體會如此慘狀的主角，不禁痛切地說出：「農民不知道該向誰陳述自己的冤屈，也不知道剝削之癌忍無可忍時，該向誰抗爭」(23)。甚至當主角在遠隔重洋的美國時，還不時想起「在那塊遙遠土地上，充斥我生命中那種壓榨的恐怖，而生起義憤」(5)。

其實，農民未必不知道該向誰抗爭。當久遭壓榨的他們忍無可忍時，也有爆發的一日。主角在病榻上聆聽兄長馬卡里歐講述舊約聖經上摩西的故事時，馬卡里歐告訴他，在菲律賓也有類似拯救苦難眾生的人物黎剎 (José Rizal)，後來被西班牙人處死。主角聽了頓時生起效法之心，願意為家人奮鬥，即使受苦也在所不惜 (46)。<sup>12</sup>此外，喪失土地的農民組成的科洛倫黨 (the Colorum Party) 舉黑旗起義，帶頭的是受過大學教育，卻在美國吃苦、受挫的農夫 (60)，此黨與官兵的戰事最初互有勝負，雖然不久敗北，但二哥魯西安諾

<sup>12</sup> 書中後來提到主角絕望時，轉而閱讀童話故事，並對民間傳說感興趣，這把他帶到「菲律賓英雄的生平」，從而來到「我們歷史的主要動力——黎剎」(260)。卜婁杉在〈菲律賓文化的成長〉(“The Growth of Philippine Culture”)一文中，以將近五分之一的篇幅闡釋黎剎的重大意義 (1995b: 118-120)。他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的信中也提到：「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愉悅和熱情……我願意重複黎剎為菲律賓文學所做的事」(Bulosan, 1979: 150)。他的哥哥在接受訪談時指出，菲律賓人的「革命精神是被他們的英雄黎剎所激發的。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弟弟臨死前試著寫一齣有關黎剎的戲」，但只寫出了兩幕，並遺留下大綱 (Chow, 1979: 164-165)，便溘然去世。卜婁杉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書信中更寫道：「如果我能活著寫出 [我計畫中有關黎剎的書]，那將是我的力作 (*magnum opus*) ——其實就是我給菲律賓人的禮物和最後的遺囑」(Bulosan, 1960: 49)。卜婁杉對黎剎的景仰與效法之心由此可知。

(Luciano) 向他解說此事的意義，主角也決定要離開此一惡劣環境，成功之後再回到自己出身的農民階級，「爲自己人生中欠缺、受挫的事物賦予意義」(62)。

故鄉既然沒有生存的空間，兄長們只得前往其他城鎮尋求發展，「敲擊不可知的黑暗，尋求生命的聲音；即使只有短暫的回音，他們都會回來和家人分享」(11)。留在菲律賓打拚固然是一種選擇，但畢竟是在相同的大環境之下。至於「不能再忍受 [菲律賓的] 生存條件的人，則冒險到 [美國這塊] 新土地」(5)，因爲相繼在西美、菲美戰爭中獲勝的美國，使得菲律賓人也成了他們的子民。因此，前往美國謀求發展雖然意味著家庭的離散，但也提供了一條出路。這說明了爲什麼主角和兄長相繼離鄉背井，遠赴異地。

### 參、階級與族裔的結合：被殖民的階級片段

懷著對美國的憧憬，主角踏上了這條希望之旅（至於作者本人離開菲律賓之後，就未曾返回故土，最後客死異鄉）。如果說第一部藉著描寫自己的家庭來呈現菲律賓農民的普遍困境，那麼從第二部起便是敘述自己在美國的各種體驗，來呈現美國主流社會如何背離了建國時所揭櫫的「人生而平等」的美國夢，對於其他種族施加種種個別的、結構性的歧視。主角在第一部裡萌生的階級意識，並未因爲來到美國而消失，反倒與親身遭逢的種族歧視結合，在原有的階級因素之外，又加上了族裔的成分。

換言之，族裔因素於第二部作者抵達美國之後開始出現，並結合階級因素，形成了巴雷拉 (Mario Barrera) 所定義的「階級片段」(class segment)：「階級片段是階級的一部分，由於某種明顯可辨、相當穩定的標準，如種族、族裔或性別，而有別於階級裡的其他部分，而且它與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的關係也受到那種區別所影響」

(1979: 101)。他進一步依照族裔的因素細分出「被殖民的階級片段」(colonized class segment):「根據種族和/或族裔所區分出的附屬的階級片段,可稱為被殖民的階級片段」(1979: 101)。<sup>13</sup>

就《美國在我心》而言,「被殖民的階級片段」不只形同某種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還具有更深的意涵,因為主角在美國不但由於族裔因素而遭到歧視(這點和其他弱勢族裔一樣),加深他對階級的感受,而且在政治與法律上,他是來自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的被殖民者,在文化上更已內化了美國夢(American dream)。弔詭的是,與書中盛讚的美國夢對比,他的實際遭遇反倒成了「美國夢魘」(American nightmare)。話雖如此,美國夢所揭櫫的理想卻成為主角反抗階級壓迫與種族歧視的利器,他以此理想結合實際行動,如組織工會與寫作,來反擊揮之不去的夢魘。在聖·璜看來,作者「把疏離重新銘刻於階級和種族對立的基礎上」,藉此化解「失去家鄉(殖民地)和族裔疏離的危機」的同時,也「抗拒了建立在剝削階級和民族弱勢者的帝國主義」(San Juan, 2000: 23)。

<sup>13</sup> 巴雷拉在《美國西南的種族與階級：種族不平等理論》(*Race and Class in the Southwest: A Theory of Racial Inequality*)一書中的實證研究之後,於第七章〈種族不平等理論〉列舉三類種族不平等理論(缺失理論 [deficiency theories]、偏見理論 [bias theories] 與結構性歧視理論 [structural discrimination theories]),詳細分析各類理論的利弊得失,並加以圖示(1979: 174-204)。他將殖民主義和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納入結構性歧視理論中,將前者定義為依種族或族裔來區隔宰制團體與被宰制團體,以圖利宰制團體(193),後者則是殖民主義的一種,但其中的殖民中心與殖民地並無地理之區隔(194;內在殖民模式的相關圖表見頁196)。在巴雷拉看來,殖民理論固然有其限制,但在解釋種族不平等時卻較符合歷史,且較具有理論說服力(203-204)。他進一步闡釋馬克斯派的階級觀,並結合內部殖民與階級片段的方法來解釋種族不平等(212-218;相關圖表見頁215)。正文中有關「階級片段」與「被殖民的階級片段」之說法便是這種研究脈絡下的產物。

如此抽象定義的「被殖民的階級片段」，在卜婁杉筆下化爲一幕幕怵目驚心的實景。從第二部中，我們看到他抵達美國之後所遭遇的種種迫害，在無法適應及無力反擊之下，有如驚弓之鳥，一路倉皇逃逸，顛沛流離，<sup>14</sup> 在艱難的處境下激發出人性的醜陋面，甚至訴諸瞋恨與暴力。儘管如此，主角面對一連串的打擊、失望與挫折，依稀懷抱著希望，渴求新生。

主角在美國飽受種種歧視，橫遭重重打擊，「我這種恐懼和逃亡的生活，教我找尋最近的出口」(181)。在美國面對的歧視與打擊，與第一部相較，顯示了在菲律賓所受的壓迫來自階級，而在美國除了延續階級的因素之外，顯而易見的則是族裔的因素。而主角和同志奮鬥的目標，一言以蔽之，就是爲了爭取人的尊嚴——就像與他一塊逃亡、從事工運的荷賽 (José) 所說的：「這是勞資之間的戰爭。但對我們族人卻是另一回事。這是肯定我們有權再度成爲人」(186)。對立面的資方則遊說在州的層級和國會立法，「嚴格管制移民勞工，大的農場主人甚至剝奪農場勞工所有的自由權」，打擊工會的活動，以致恐怖主義盛行 (294)。

儘管在法律與政治上，來自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相對於其他亞裔，在宗主國應享有較合法、安穩的地位，但是立國精神與法律條文畢竟難敵美國主流社會排擠非我族類的心態以及看待異己的刻板印象。主角對於菲律賓人在美國的困境有如下的深切體會：

後來我逐漸知道，就許多方面而言，出現於加州的菲律

<sup>14</sup> 在第三十章，主角依然說：「我還在走迷宮，似乎不可能停留在一個地方而不覺得被迫害和獵捕」(223)。甚至到了第三十七章，還有美國雖大，菲人卻無處容身之嘆：「在這塊廣闊的大陸，有沒有一個地方能讓菲律賓人平安過日子？」(258)。黃秀玲 (Sau-ling Cynthia Wong) 在研究此書的移動主題 (mobility theme) 時，條列出主角到過的地名，去其重複，共有六十個之多，令人驚訝 (1993: 133)。難怪此書主角給讀者的印象總是在逃亡。

賓人是一項罪行。我逐漸知道，公共街道對我的族人來說並不是自由自在的：每次這些警覺的巡邏人員看到我們開車，就把我們攔下。每次人們看見我們和白人女子在一塊，就懷疑我們。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把我們的生活窄化成一座島，窄化成美國社會骯髒的片段，把像是多羅 (Doro [他的同伴]) 這樣的菲律賓人趕向 [封閉的] 內在，痛恨每個人，而且輕視所有朝向自由的正面堅持。(121)<sup>15</sup>

這種處處被當成罪犯、時時活在監視之下的情況，就像置身無形的監獄，甚至伴隨著暴力的威脅，往往逼得弱勢族裔更加封閉、軟弱與墮落——雖然偶爾夾雜著間歇性的反彈。對主角來說，最痛心的莫過於這種凌虐逼出了人類的獸性，使得「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並且塑造出「哀莫大於心死」那種「冷冷的乖戾心態」(“cold cynicism”) (135)。他認為，「我們的墮落是由一個外在的社會強加在我們身上的，這個社會外在於我們的性格與傾向、外在於我們的傳統與歷史」(135)。結果使得主角身心俱疲，傷痕累累，外在的疤痕容易痊癒，他卻擔心內在的傷痛會扭曲自己的人性，以致「在面對獸性時，總是害怕會對自己和別人做出什麼事來。我很怕自己，因為野獸、怪物、愛與仁慈的殺害者會抬起它黑暗的頭，拒斥生命中的善與美」(135-136)。而他數度怒不可抑所爆發出的暴力行爲(包括持刀要殺白人 [163])，在在讓人驚識到由絕望所產生的瞋恨具有何種自毀毀人的力量。這使得他惶惑，「難以理解為什麼菲律賓人既野蠻又溫柔，也難以理解他們之所以這樣是美國的現實造成

<sup>15</sup> 甚至在住宿時也還難免這種心態：「在其他地方，我覺得像是罪犯，惶恐地跑進自己的房間，滿心狐疑地關上門，彷彿全世界都串通起來對付我」(306)。而在本書出版之前兩年的一封書信中，卜婁杉寫道：「是的，我覺得像是罪犯，逃離自己沒有犯下的罪行。而那項罪行就是：我是在美國的菲律賓人」(Bulosan, 1979: 144)。

的」(152)。

書中種族歧視的事件不勝枚舉，即使在對他有如避風港的醫院裡也無法倖免 (253)。令人髮指的惡行包括了白人夜襲僱用主角的法國人，槍殺他的女兒，放火燒他的房子，而主角和另一友人僅以身免 (110-111)。在加州南端時，他聽說「當地白人夜裡帶著獵槍在狙殺菲律賓人」，不久也聽說「有一位菲律賓的勞工組織者被發現死於溝渠中」(144)。而一名娶了美國女子的菲律賓人在被餐廳逐出後，轉而想為飢餓的小孩買牛奶，卻遭到怒罵：「你這天殺的棕猴子好大的膽，竟敢娶我們的女人」，並以拳腳相向，此人憤而反擊時，又被一群白人以木棍和拳頭打得不省人事，最後被兩名副警長帶走 (144-145)。一天晚上有人夜襲，他與同夥倉皇逃逸，不多時便見到房子起火燃燒 (145)。甚至有整個菲律賓勞工營被燒的情事。主角「了解那是種族的問題，因為我所到之處都看到白人攻擊菲律賓人。我會痛恨、懼怕白人，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146)。

弔詭的是，族裔因素固然顯見於白人主流社會對異族的種種壓迫，但其他弱勢族裔之間也有不和的情事，如華人賭場賺取菲律賓人的辛苦錢 (118, 179)，菲律賓人打劫日本人 (165)，日籍勞工仲介商僱人殺害工會領袖 (222)，菲律賓人拒絕光顧日本商店 (275)，菲律賓工人罷工時，公司轉而引進墨西哥工人 (206)，與菲律賓人相較，黑人成為更弱勢的代罪羔羊 (137) ……凡此種種反映了弱勢族裔之間叢林法則的盛行。

然而，同族之間也未必就能免於壓榨和剝削。如主角剛到美國不久，就被人以五美元賣給一個菲律賓人，送到阿拉斯加的魚罐頭廠工作。在他看來，「這是在美國生活的開始，我這些年來漫長逃難的開始，死命地奮鬥，要在人生的某個角落找到安寧」(101)。也是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有意組織罐頭工人工會的夥伴，這種情

誼並隨著「在美國的菲律賓人之間的工會運動和進步觀念而成長」(101)。菲律賓移民欺瞞、剝削自己族人的情況不止於這一例。如一個名叫派艾茲 (Cornelio Paez) 的工頭帶領主角一行人幫人採蘋果，快採完時卻捲款潛逃 (107-109)。又如主角在各方奔走試圖串連時，依然發現「有三位菲律賓農場工人仲介商控制了葡萄業，有將近三千個菲律賓工人依附他們，這些人住在擁擠的臨時工寮裡。」此情此景不禁令他痛切指陳：「到處都是剝削，即使在我們之中也是如此。這和我多年前知道的並無兩樣」(274)。由菲律賓移民之間的相互剝削與傾軋，可見在某些方面族裔因素的說服力有其限制。

此外，書中也不乏若干白人的友善與支援，甚至仗義執言，與受壓迫的人一起奮鬥。如白人女子瑪麗安 (Marian) 在他逃亡期間伸手搭救、提供金錢支援，臨終時要他承諾要愛、不要恨，因為「在你身上像是有內在之光在照射，而且會影響別人。答應我讓它發揚光大……」(217)。再者，受歧視的族裔之間也有相濡以沫的表現。凡此種種印證了此中不僅涉及族裔，更涉及階級。

面對階級與族裔的雙重壓力，支撐主角的是對理想的堅持，以及「不信公理喚不回」的決心——尤其是對於美國夢的堅持。

## 肆、內化的價值觀及其運用／反擊：美國夢與魯濱遜

《美國在我心》之名值得仔細思量。底下幾段文字出現於第二部結尾，點出了書名的意義。主角幼年時在菲律賓的啟蒙導師——他的兄長馬卡里歐，在美國歷經滄桑之後，再次啟迪他有關美國的種種。馬卡里歐揭櫫美國夢的偉大理想，對比於現實環境中以種族和階級來分化、壓迫異族的惡劣行徑：

我們必須生活在一個不分任何膚色、地位、信仰都享有自由的美國。偉大的美國人以無私的奉獻，投注於一個目標，也就是運用多民族的力量來達成美國的自由，並以此為指導原則。在這一點上我們是相同的；我們也必須為這樣的美國奮鬥，讓任何人都有無限的機會來發揮自己的潛能，恢復自己應有的尊嚴。(188-189)

馬卡里歐接著談到種族與階級，並指出它們不該成為自由的障礙：「美國這塊土地不屬於一個種族或一個階級，這種說法是再公平不過的了」，因此從最早的原住民到最近的菲律賓人，都是「辛勞工作、受過苦難、知道壓迫和失敗的美國人」(189)。底下的說法不但點出書名，並且「宣告美國為己有」(claim America)：

美國在過去為自由而死的人心中；也在現今正在建設新世界的人眼中。美國是新社會人類的預言：在這個體系裡不會有哀傷、爭鬥或苦難。對於那些試圖扭曲自由人的理想 (the ideals of freemen) 的人，美國則是警告。

……我們所有人，從始祖亞當到最近的菲律賓人，不管出生於本土或外地，受過教育或目不識丁——**我們就是美國！**  
(189)

這幾段文字鏗鏘有力，對美國夢極盡頌揚，固然在美國的脈絡中具有特殊意義，但也涉及若干普世的價值。根源於清教徒論述的「『美國主義』的意識形態」(the ideology of “Americanism”)，相信美國充滿了希望與機會，甚至精神上的救贖 (Mostern, 1995: 36)。這種憧憬吸引了許多人來到美國。然而理想與現狀之間、「美國的民主修辭與反亞裔的排斥的現實」(“the democratic rhetoric of America and the reality of anti-Asian exclusion”) (Chu, 2000: 42) 之間，畢竟存在著巨大的落差，無可避免造成許多人的挫折、失望，甚至絕望。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對於美國理想的闡揚出自馬卡里



歐，而他固然對主角經常扮演著啓蒙者的角色，但本身的表現起伏不定，主角一度還指稱他有理念卻未能實踐，「性向上是知識分子，幻想者，夢想家」(“by inclination an intellectual, a visionary, a dreamer”) (103)。這種說法不但與主角的角色及作為形成對比（詳見第五節），也暗示主角本人對於美國夢的態度：承認馬卡里歐所宣告的美國理想（這正是美國人一向自豪的美國夢），但自己的親身體驗印證了「美國社會的偽善，尤其是環繞著種族的議題」(Nguyen, 2002: 26)，彰顯出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對於像主角這樣自許具有改革精神的菲律賓人而言，堅持理想，結合有志一同的人士來縮小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是唯一可行之道，也是他所致力的目標。<sup>16</sup> 換言之，主角從事的雖然是美國主流社會所疑慮的勞工運動，但目標卻正是為了實現美國夢。<sup>17</sup>

然而「美國在我心」的說法卻有諸多曖昧、弔詭之處。首先要問的是：美國為何在心中？就菲律賓人而言，在殖民主的「文明化任務」(civilizing mission) 裡，美國提供了公立學校的系統，在「『美國化』的學程」(the “Americanization” program) 中，美化了美國，「這種教育在學生心目中孕育了對於美國的理想化景象」，其後果便是「種族化與『美國化』」(“racializ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Bonus, 2000: 33)，如影隨形，揮之不去。由於被殖民者內化了殖民主的價值，以致信奉美國的理想及美國例外論 (American excep-

<sup>16</sup> 卜婁杉的兄長在接受訪談時提到，與其他亞裔勞工相較，菲律賓人最激進、有組織、反壓迫，而這來自長期的反殖民歷史經驗 (Chow, 1979: 164)。在文學方面，聖·瓊一九七一年在《菲律賓文學的激進傳統》(The Radical Tradition in Philippine Literature) 一書中，也把卜婁杉置於自黎剎以降具有革命意識的作家，並以「黨派美學」(partisan aesthetics) 一以貫之。

<sup>17</sup> 摩蘭特在有關卜婁杉的傳記中便說：「卡洛斯愛美國，但那是一種理想式的愛，帶有些許浪漫主義的色彩」(1984: 95)。

tionalism)，「即使相信美國要為對弱勢族裔所犯下的罪行負責，但也相信美國的民主政治和美國的文化會為這些罪行提供解決和治療方式」(Nguyen, 2002: 26)。許多菲律賓人對於美國的理想化與浪漫化，不但代表了「殖民心態」(“colonial mentality”)，甚至自貶為「心理殖民地」(“mental colony”) (Gamalinda, 1996: 3)。作者雖然在書中寫下了諸多種族歧視的惡行，但書前的獻詞依然題為：「讓這本書成為一位盼望成為美國一份子的人之證詞」。然而，如果這些有關自由、平等的理念具有普世的價值，為什麼非但未能在菲律賓生根，甚至在美國本土也因階級和種族等因素而窒礙難行。如果這些不具普世的價值，為什麼不只對菲律賓人有吸引力，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相信美國是充滿機會的「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而紛紛移民？<sup>18</sup>

另一個問題便是：美國如何在心中？被殖民的菲律賓人對於美國的理想化，係透過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意識形態的機制。然而愈是理想化的看法，與現實的落差便愈大。換言之，美國夢與美國夢魘實為一體的兩面，愈是美好的夢，未能實現時則淪為愈醜陋的夢魘。這種對比與反諷在書中表露無遺：一方面不時宣稱理想的美國應該如何，另一方面不斷呈現主角在現實的美國一再受挫、遭害，甚至幾度僅以身免。進一步說，我們不但看到主角受到各種的歧視與迫害，更訝異地發現，他依然不改對美國夢的信仰與堅

<sup>18</sup> 對於「美國為何在心中？」的另一種答案就是：因為在現實世界裡找不到心目中的美國 (Alquizola, 1989: 216; Wong, 1993: 134)。李 (Rachel C. Lee) 把它稱為「卡洛斯心中的美國」(“the America in Carlos's heart”)，並說：「此文本顯現的與其說『美國』是什麼，不如說『美國』不是什麼」(“not so much what 'America' is as what it is not”) (1999: 25)。歐蘭登 (Margarita R. Orendain) 則說：「這個美國是所有人心中的無名地域，這些人懷抱著普遍和平、共享繁榮之夢想，心存著以自己現在的模樣被接納之希望，孕育著免於哀傷和貪婪之願景」(1988: 375)。根據這個描述，美國可真成了烏托邦 (理想國/子虛烏有之地) 了。

持。或許正是由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與張力，更使陷身／獻身其中的有志之士堅決致力於縮小兩者之間的差距。

不論是美國夢或美國夢魘、理想的美國或現實的美國，主角在理念和行動上時時不忘美國則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對主角和美國更尷尬的問題就是：你眼中、心中有美國，但美國眼中、心中有你嗎？從書中的敘述來看，在面對菲律賓人時，美國的態度往往不是目中無人，就是——更糟糕的——把非我族類視為低人一等，甚至加以非人化 (dehumanize)、妖魔化 (demonize)，進而「順理成章」地給予非人的待遇。荷賽和主角在召集的菲律賓勞工聚會中，與會者提出的十項質疑 (像是為什麼警察待他們如罪犯？為什麼他們不能從事公職？)，具體呈現了他們在加州蒙受的不公平待遇 (268-269)。研究加州菲律賓工運的德威特 (Howard A. DeWitt) 指出，「菲律賓的政治人物、商人和知識分子……同意加州最著名的菲律賓作家卜婁杉的說法：『菲律賓人被教導去認為美國人和我們是平等的』。而卜婁杉在他的分析結論時主張，美國對於種族所抱持的態度嘲弄了正義和平等的觀念」(1980: 6)。就是這些不人道的行徑，完全背離了美國的建國精神和一向標榜的理想。

然而，主角在醫院中也見識到了美國的另一面。同樣是「像那些拒絕我們的美國人」的白人，卻給予他「庇護與容忍」。這種「美國的弔詭」(the paradox of America) 讓他大惑不解：「為什麼美國如此仁慈，卻又如此殘酷？難道沒辦法簡化這塊大陸上的事情，讓痛苦降至最低？難道沒有我們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標準？我既憤怒又惶惑，不知道自己終究能不能了解這個弔詭」(147)。<sup>19</sup> 而與他交往、介紹他讀許多書的艾琳 (Eileen [Odell])，「無可否認的，是我在那些恐懼和逃亡的倉皇日子裡、在那些飢餓和寂寞的嚴苛時

<sup>19</sup> 然而前文指出，他在另一處提到，即使在醫院裡也難逃種族歧視 (253)。

光中所要尋找的**美國**。這個美國是人性的、善良的、真實的」(235)。因此，全書呈現了作者對美國的矛盾態度 (*ambivalence*)——理想的美國令人嚮往，現實的美國卻令人痛苦、神傷。二者之間的落差雖令主角失望、挫折、憤怒，卻更激發了反擊的決心，並企盼藉此縮小兩者之間的距離：「仇恨使我寂寞，渴求愛——那種能夠恢復美與善的愛。我期盼的是人生，善與美的人生」(164)。

主角內化主流價值的情形，以隱喻的方式出現於他對魯濱遜 (*Robinson Crusoe*) 故事的體會。主角首次聽到魯濱遜的故事是在童年時的菲律賓故鄉。他因落水而臥病，馬卡里歐帶了一本魯濱遜圖畫書在病榻旁為他誦讀。遭逢海難的魯濱遜如何憑著堅強的意志和靈活的手藝在荒島求生，這個故事本身的確引人入勝，讓年幼的他興起去探訪故事中那座島的念頭。兄長對這個故事的引伸讓他印象深刻：「你必須記住魯濱遜的好榜樣。……也許有一天你會孤單單一個人在世上的某處，那時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靈巧。……也許有一天你會被丟棄在某個不為人知的島，唯有靠自己的雙手和心靈來保護自己」(32)。

孤島求生的比喻於主角在異國身陷困境時再度出現。他在美國歷經一連串的剝削、打擊與挫折，後來因肺病住院，周遭的病人知識水平低落，無法溝通，他為了避免遭排斥也戴起「偽裝的面具」(“*a mask of pretence*”) (252)，假裝無知無識。這種處境讓他在美國覺得頗為失落，不禁想起孤島上的魯濱遜：「我回憶起魯濱遜，把他和我的命運相比。但我的失落更深沈，因為我是在人群之中的寂寞。這種失落感將環繞我的人生，包圍它，戕害我的視野，以致我的思緒中充滿了憂鬱」(252)。這種處境連社工人員都幫不上忙——因為，甚至連女社工人員都懷有種族歧視，當著他的面說：「你們菲律賓人應該被運回你們在叢林裡的家！」(253)。結果又是馬卡里

歐的大力協助，使他得以離開待了整整兩年的醫院，擺脫異地孤絕的情境。

第三次提到魯濱遜是在倒數第二章，這時四哥阿馬多 (Amado) 已加入海軍，馬卡里歐也在日軍攻陷菲律賓的科雷希多島 (Corregidor) 時參軍。主角在馬卡里歐入伍前與他相見，提及在病榻旁為他誦讀初級讀本的童年往事，這使得馬卡里歐憶起了魯濱遜的故事，並說：「世界是一座島，我們被丟在茫茫的人生之海，希望能在世上的某處登陸。但是只有一座島，而它就在心中」(“*But there is only one island, and it is in the heart*”) (323)。此時兄弟即將各奔東西，回首前塵，展望未來，雖然世事難料，前程未卜，相逢無期，但至少馬卡里歐初次有關魯濱遜故事的引伸 (在荒島上只能靠雙手和心靈保護自己)，於此時此地另有一番深意。而這座島「就在心中」的說法，與書名雷同，引發聯想也是意料中事——美國對他有如荒島，也似瀰天蓋地、無所遁逃的世界，在人生之海漂泊的人，僅能仰仗自己，最終只能在心靈中尋得安頓之處。<sup>20</sup>

兄弟二人有關魯濱遜的領會，多少對應於有關這位冒險者的若干詮釋。就本篇論文而言，魯濱遜至少具有三重不同的意涵。最基

<sup>20</sup> 一九七八年，聖·璜為卜婁杉編輯、出版了《菲律賓在我心》(*The Philippines Is in the Heart*) 一書，主要是有關菲律賓的小故事，尤其是家人的軼事，往往出於幽默與諷刺的手法，充滿懷舊的意味，與「美國在我心」這種把宗主國放在心中的嚴肅大相逕庭，但其中也透過「反諷、寓言和其他象徵手法，斥責壓迫和剝削」(San Juan, 1978: viii)。《美國在我心》中提到一位定居美國多年的法國人說：「家是我心所住之處。[我的] 家是在諾曼地的藍色山丘」(172)。而卜婁杉在〈一切活生生的恐懼〉(“*All the Living Fear*”) 一詩中，以類似情詩的方式，表達了大異其趣的看法：「美國位於生活在其中的人心中。／但它值得前來，犧牲，理想主義。／是的，它值得所有這一切——以及夜晚的孤寂」(“*America is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that live in it. / But it is worth the coming, the sacrifice, the idealism. / Yes, it is worth all these—and the loneliness at night.*”) (Bulosan, 1996: 219)。

本的當然就是《魯濱遜冒險記》作為冒險文學和殖民文本：魯濱遜個人如何與惡劣環境搏鬥，胼手胝足，自力更生，在荒島上打造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據地為王」。<sup>21</sup> 其次，這種「據地為王」的心態與行徑和清教徒「發現『新』大陸」之後的作為頗為類似。此塊大陸雖遠在海外，蠻荒無文，卻是清教徒眼中的應許之地。在這塊土地上，清教徒面對弱勢的美洲原住民，予取予求，隨心所欲地遂行自己的意志，使得原先避禍、尋求自由的這些人，搖身一變成為新的殖民主。再者，經過多年的開拓與經營，美國成為許多海外人眼中的應許之地，紛紛移民。然而面對已存在多年的主流文化與社會，弱勢移民的處境艱難，即使如魯濱遜般努力奮發，也因為族裔、階級等因素，在文化、社會、經濟、政治上淪為新的被殖民對象，有如「內部殖民」和「被殖民的階級片段」。<sup>22</sup>

由閱讀魯濱遜的事例，可以看出文學在形塑觀感時的重大作用，甚至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其中的意識形態。然而，經由反省或去學 (unlearning)，也有可能挪用於始料未及的地方，並對原先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這點類似主角運用美國的理想／理想的美國，以寫作來批判美國的現實／現實的美國。

<sup>21</sup> 如薩依德 (Edward W. Said) 便認為，身為「現代寫實主義長篇小說的原型」([t]he prototypical modern realistic novel) 的此書，「內容涉及一位歐洲人在遙遠的非歐洲島嶼創建自己的封地，這絕非偶然」(1993: xii)。另外，他也指出，「若沒有允許他 [魯濱遜] 在遙遠的非洲、太平洋、大西洋蠻荒之地創建自己新世界之殖民任務 (the colonizing mission)，簡直是無法想像的」(1993: 64)。

<sup>22</sup> 就「內在殖民」和「被殖民的階級片段」而言，湯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金山勇士》(*China Men*) 中的“Lo Bun Sun”，比卜婁杉筆下的魯濱遜更為恰切。相關討論可參閱 Shan (2001)。

## 伍、作家與知識分子的角色

對菲律賓人而言，美國殖民統治的「好處」之一就是引進了普及教育 (popular education)，把早先西班牙殖民統治時只有統治者和富有人家才能接受的教育，相當程度加以開放 (14)，雖然還不到完全普及的地步，但至少提供了不少窮人子弟翻身的機會。這也就是為什麼主角的父母再怎麼窮苦，也要傾全家之力，集中資源供一個兒子上中學，而馬卡里歐就成了「我們的驕傲和我們所有的希望之星」(12)。

馬卡里歐接受教育固然為個人打開了一條生計，也為全家提供了希望，但對主角本人最重要的就是經由他接觸到書籍，尤其是在菲律賓和美國臥病時，有更多時間閱讀，確立自己的想法。因此，他在病榻上不僅是肉體的休養與康復，更藉由閱讀達到知識和精神上的啓蒙。質言之，閱讀對主角不只是排遣時間，更在其中認知了世界、確定了自己。在菲律賓時的初次啓蒙，為懵懂的他指引大略的方向，認知了人生的孤獨處境和堅強意志的重要。進一步的啓蒙則是在來到應許之地的美國，遭遇了一連串的歧視與虐待、悽悽惶惶四處奔逃之後，更落實了先前的觀感與信念，閱讀與經歷更加相應，從而確立自己的目標，作為未來積極實踐的張本。

其實，他真正接觸到的第一位作家是個在美國貧病纏身的族人埃斯特萬 (Estevan)。他跳樓自殺後遺留下一疊疊未出版的稿子，主角帶在身邊，十年的豐富歷練之後再讀，「開始重新發現我的故土，在那裡孕育我的文化之根，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認同族人的社會覺醒」(139)。此外，他在美國大量閱讀的作家和作品，反映出了他的興趣及取向，並與他的創作密切相關。因此，「閱讀就是賦予力量」(reading as empowerment) 對主角來說絕非徒托空言，而是真切的感受與體驗。他之所以提筆寫作，當然也與對於文學的深切感受、

體悟、信念有關。

對於歷盡滄桑、飽受憂患的主角來說，寫作絕非無關痛癢的事，而是「有所為而為」。他藉著「投入美國與菲律賓的集體主義式的和普羅的政治」(“a collectivist and proletarian politics”) (Gier, 1995: 14)，而為被壓迫、被(內在)殖民者吐露心聲。他首次嚐到寫作之樂其實是在寫信給馬卡里歐時，他邊寫邊飲酒，甚至邊笑邊哭。發現自己能用英文寫作，他歡喜異常：「寫完長信時——這封信其實是我的生平故事——我一躍而起，眼中泛著淚光高呼：『他們不能再讓我沈默了！我要告訴全世界他們對我做了什麼！』」(180)。由此可見，對他來說，寫作不僅限於消極的「一種治療」(如金惠經所言 [Kim, 1982: 54])，而是發聲 (writing as voicing)、匡正／奮戰 (writing as righting/fighting)。

接著他在一位菲律賓社會主義者帕斯夸爾 (Pascual) 的鼓勵下寫稿——這位編輯鼓勵他：「寫出你的肺腑之言！用雷鳴和鮮血來寫！」(183)——藉此促進旅居加州的菲律賓人的社會覺醒，組織獨立的工會。他將帕斯夸爾的臨終遺言謹記在心：「我們必須為工人寫作。我們必須把他們的希望詮釋為一群要求完全實現自己潛能的人。我們的聲音要堅定，我們的批評、抗議、挑戰要客觀。再也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打擊壓抑個人自由的任何嘗試」(187)。經由帕斯夸爾，主角有了新一層的認知，了解「在美國活力充沛的社會鬥爭……計畫在加州的菲律賓人之間散播進步的理念」(187)。後來主角接掌了編輯工作，為提升菲律賓移民勞工的社會意識而奮鬥。

接續帕斯夸爾未竟之志的主角堅信「舊的世界必須死去」(193)，在他與同志的努力下，出版了第一期《新潮》，並親自發送給粗通文墨的農場工人：「這是在美國的菲律賓人出版的第一種這類刊物，雖然仍在摸索、還不成熟，卻有希望成為在菲律賓人社會



覺醒史上具有意義的東西。」由三個瀕臨飢餓邊緣的人所支撐的刊物雖然不久就停刊，卻鼓動風潮，引發了其他類似的刊物，並「嘗試掌握社會現實，而且以時代的需要來詮釋社會現實。它維持了我們的生活，驅散了我們的絕望，賦予了我們希望。它拓展了我們的範圍和視野」(193)。總之，除了這些社會和歷史的意義之外，《新潮》的印行也讓長久以來在美國社會一再受挫、敗退、逃亡的菲律賓人，能一吐胸中的塊壘，激發社會意識，組織、串連，而以英文發刊更易與一般社會接軌。繼起的刊物以工運為主要議題，而主角也積極參與菲律賓工人協會 (the Filipino Workers' Association) 的運作，並促成了幾次罷工，使他感覺自己「確實是工運的一份子」(199)。然而工運在面對有組織的密謀反對下，也遭到不少反挫，甚至有日本籍勞工仲介商僱用殺手謀害了幾位工會的領導人士(222)。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主角和同志們依然以文字、組織、運動為理想奮鬥不懈。

除了在工運刊物上撰稿之外 (其中不少是有關個人的體驗)，主角的另一個突破就是寫詩。引發他寫詩的是一位熟知青年共產主義聯盟 (the Young Communist League) 的女子崔弗絲 (Dora Travers)，<sup>23</sup> 而主角因為「寂寞人生使我對於文字與聲音敏感，只要其中一樣觸及我的內在感受，我就陶醉」(224)。崔弗絲不但是引

<sup>23</sup> 朱 (Patricia P. Chu) 指出，書中的白人女子扮演三種角色：致命的女人 (Helen，此女為破壞工運的內奸)，沈淪的天使 (Marian/Mary Magdelene)，繆司和文學導師 (36-37)，崔弗絲顯然屬於第三種。本文由於篇幅所限，無法如一位匿名審查者所建議，就其中複雜的性別議題加以探討。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李一九九九年討論卜婁杉與美國的性別政治的專章〈情同手足：卜婁杉與美國的性別政治〉(“Fraternal Devotions: Carlos Bulosan and the Sexual Politics of America”)，收於《亞美文學裡形形色色的美國》(*The Americas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頁 17-43。此外，巴雷拉在分析族裔與階級時曾提到性別的因素，但也只是點到為止 (1979: 102-103)。

發他寫出第一首詩的靈感，並且鼓勵他繼續寫詩：「我不管你是不是共產黨。我喜歡你的音樂。我認為你會成為優秀的『美國』詩人」(224)。<sup>24</sup> 受到鼓勵之下，主角覺得「自己內在有音樂，翻騰著要誕生」，當下徹夜寫詩，文字「毫不費力地來到我心中，一口氣寫出十或十五首」(224)。但最重要的是，寫詩讓他覺得自己成為「嶄新的人」，因為「現在我能用心靈，而不只是用雙手，與世間奮鬥。不再有人能奪走我的武器。即使周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殘暴，我都有公平存活下去的機會」(224)。此後他勤奮寫詩，在著名的詩刊發表，感受到「一大勝利，而且肯定地認同了一個知識傳統」(227)。

寫作與主角的閱讀密切相關。馬卡里歐透過閱讀開啓了主角的想像與喜好。魯西安諾在病逝前要他「不停地讀好書」，因為「閱讀是心靈的糧食」(56)。在訪談中，他的兄長也說到卜婁杉本人「一直在閱讀，是個如飢似渴的讀者」(“a voracious reader”) (Chow, 1979: 158)。他的閱讀範圍甚廣，《美國在我心》一書中提到了許多作家及作品，對於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242)、克雷恩 (Hart Crane) (245)、高爾基 (Maxim Gorki) (246)、惠特曼 (Walt Whitman) (251) 著墨較多，也提到了中國作家魯迅，認為在「尊嚴與人性」的處理上與高爾基相仿 (246)。<sup>25</sup> 從他的大量閱讀中可發現兩大取

<sup>24</sup> 這個說法頗為有趣，宛如詩可以超越政治黨派，卻以進入美國文學傳統為榮，換言之，並未超越國籍。這裡表現出人們對殖民地作家的期許：得到宗主國文壇的認可——即使作家本人對其社會現狀頗不以為然，而且使用的英文並不是他的母語。就相當程度而言，這也是殖民地作家的自我期許。然而，卜婁杉的關懷不限於此，因為他也很關心菲律賓的文學與文化，和菲律賓的文壇與文化界維持相當密切的關係。

<sup>25</sup> 書中提到的文學作家甚多：Richard Wright (71), Hart Crane, Malcolm Cowley, William Faulkner, Carl Sandburg, John Gould Fletcher, Vachel Lindsay (228), Herbert Gorman, Marcel Proust, Frederic Prokosch (232), Rainer Marie Rilke, Franz Kafka, Ernst Toller, Federico Garcia Lorca, Heinrich Heine (237), Laura Claredorn,

向，一為美國作家，另一為著重人性及社會寫實的作品，二者相輔相成，為他定下寫作的基調。這也是為什麼卜婁杉認為作家的產生絕非偶然，而是結合閱讀、寫作、經驗三者，以此為「堅實的先決條件，才能開始作家的艱苦生涯」(Bulosan, 1995c: 109)，而在「真誠的藝術家或作家之後的」，則是「社會條件、歷史和人民的奮鬥」(Bulosan, 1995d: 144)。

因此，當他離開安全、飲食無虞的醫院時，已具備「堅實穩固的知識武器」(“an unswerving intellectual weapon”) 以面對外在的殘酷世界，「也許這次我會贏，而如果我贏了——我會不會創造出一

---

Margaret Mitchell, Ben Hecht, Joseph Hergesheimer (238), Mikhail Sholokhov (245), Maxim Gorki, Alexander Pushkin, Nikoli Gogol, Leo Tolstoi, Ivan Turgenev, Fyodor Dostoevski, Anton Chekhov, Jack London, Mark Twain, William Saroyan, Lu-sin, Federico Garcia Lorca, Nicolas Guillen, Andre Malraux, Manuel E. Arguilla (246), Henri Barbusse, Erich Maria Remarque, Romain Rolland, Thomas Mann, Liam O’Flaherty, Sean O’Casey, Walt Whitman (251), Younghill Kang, Yone Noguchi (265), Thomas Wolfe, Michael Gold (291), Howard Fast, Jesse Stuart, Irwin Shaw (305)。思想性作家則有：R. Palme Dutt, Lewis Morgan, Robert Briffault, Frederic Engels (235)。他在感到絕望時也閱讀寓言與童話故事：“*Arabian Nights*, Grimm’s *Fairy Tales*, Andersen’s *Tales*, Aesop’s *Fables*, Lewis Carroll’s *Alice in Wonderland*” (260)。此外，卜婁杉在〈身為工人的作家〉(“The Writer as Worker”) 一文說，不諱談其他作家對自己的影響：以國籍而言，「美國、法國、俄國的作家對我影響最深，尤其是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倫敦 (Jack London) 和高爾基」；就文類而言，「主要是高爾基的小說與戲劇，紀嚴 (Nicolas Guillen) 和聶魯達 (Pablo Neruda) 的詩，以及馬克斯主義者的文學批評」(1995d: 144)。上述作家中，萊特 (Richard Wright) 是少數的美國族裔作家，而卜婁杉對他的作品覺得親切。雅絲柯絲基 (Helen Jaskoski) 指出，《美國在我心》與萊特的《黑小子》(*Black Boy*) 最相近的地方在於「設想的方式和修辭的策略」(1996: 238)，兩位敘事者也特重「自己身為作家的發展」(1996: 237)。《美國在我心》除了魯迅之外，還提到韓裔美國作家康永熙 (Younghill Kang, 音譯) 和日裔美國詩人野口米次郎 (Yone Noguchi) (265)。索柏格也指出，卜婁杉自承在開始寫作時，已出版兩本自傳體小說的康永熙是他仿效的對象之一 (Solberg, 1999: 424)。

個能讓其他窮苦年輕人仿效的英勇傳奇？」(255)。<sup>26</sup> 即使在心灰意冷時偶有寫作無用之嘆 (308)，但還是致力於斯，甚至右手因巡警暴力的舊傷而急速癱瘓時，依然「用毛巾紮緊，緩慢、痛苦地書寫」(320)，因為他除了努力提升在美國的菲律賓人的社會意識之外，也一直期盼「帶著啓蒙的火炬」(228)，返回菲律賓啓迪鄉民與國人 (236)。<sup>27</sup>

因此，他的文學觀、人生觀、使命感都與閱讀、寫作、自我期許息息相關。底下的說法表達了他個人和兄弟對於文學的信念：「文學的新遠景在於向人們說話，而且被他們所了解」；「文學最偉大的責任就是：在我們的鬥爭中找出具有未來的東西。文學是活生生的、成長的東西」(188)。正因為如此，作家對於文字更宜敬謹，以期發揮最大效用。他的兄長在訪談中說：「卡洛斯曾經告訴我：『你知道，文字有心和靈魂，那就是爲什麼我很小心使用文字。就像用人一樣，你非得小心不可』」(Chow, 1979: 159)。

主角藉由寫作與行動的積極介入，印證了他對於一些普世價值的堅持，並力促其實現。在馬卡里歐參軍前，兄弟兩人最後一次見面，一向對他具有啓蒙意義的馬卡里歐說：「我認爲生命的真諦在於：把細小的事情延伸到未來，以便它們可能對其他人有用」(323)。而卜婁杉在書信中也提到：「……生命是我們借來的東西，時候到了，我們就必須更豐富地歸還。……生命中充滿了記憶，有苦有甜，豐富了我們，讓我們活著並尋找人類心靈中的高尚事物」(Bulosan,

<sup>26</sup> 值得一提的是，主角不但是在病榻上聽到魯濱遜的故事，頗得啟發，而且他在美國之所以能大量閱讀，正是因為體弱多病之故。因此，疾病固然使他肉體受限，深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無常，但透過閱讀卻在知識和心靈等方面大有斬獲，並運用寫作來發揮影響。

<sup>27</sup> 有評者指出，卜婁杉晚年愈來愈認同故鄉「國族的民主奮鬥」(“the national democratic struggle”) (Houn, 1986-1987: 189)。

1979: 148)。

爲了達到啓蒙、淑世／贖世的目標，卜婁杉本人的角色已不限於單純的作者。相對於來自「先前的社會形成」(“earlier social formations”) (Gramsci, 1988: 425)、維持現狀的傳統的知識分子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來自被剝削者的卜婁杉具有自許的使命感，致力於組織、啓蒙特定的社會階級。聖·璜指出，「被資本主義疏離的人，必須協調自己的努力和具體表現於工人階級的歷史過程，來更新自己的力量，並且變得人性化。成長、人生、未來、道德覺醒、社會意識——這些都是卜婁杉對於他時代中縱橫交錯的力量之辯證式解方之關鍵字眼」(San Juan, 1972: 92-93)。因此，他結合工人階級進行有組織的抗爭，目的在於反抗並改革現存的宰制、不公的社會，因而扮演著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所定義的「有機的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 的角色。爲了有效達到目標，他與相關的政黨人士接觸、協商，書中數度提到他和菲律賓的工運與共產黨的關係 (267, 268, 284)，而他也被報紙寫成領導罷工的「菲律賓共產黨」(279)，雖然他並非如此。

這些行徑都符合葛蘭西對於「工人階級有機的知識分子」的看法。在引介葛蘭西的觀點時，兩位編譯者指出：「工人階級有機的知識分子受到兩方面所定義：一方面是他們在生產和工作組織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他們『指引』的政治角色，集中於政黨。」此外，「普羅階級透過有意識地承擔責任，輔以吸收來自更前進的布爾喬亞知識分子階層的觀念和人員」，可望進而掌握霸權 (Gramsci, 1971: 4)。而對卜婁杉來說，這裡所要達成的霸權指的是「多數民主文化的霸權」(“the hegemony of a majority democratic culture”)，相對於「以利益爲動機的少數統治階級之菁英的、壓迫的、墮落的文化」(San Juan, 1979: 4)。

然而，這種「工人階級的有機的知識分子」的角色也有其尷尬之處：一方面主角從來不信任「菲律賓的知識階層」（“the Filipino intelligentsia”）和「大學教育出來的領袖」（“college-bred leaders”），因為自認「代表農人和工人，也是革命分子的」他從經驗得知，「關鍵時刻來臨時，根本找不到他們」（279）；但另一方面，他的自我教育卻招致共產黨的懷疑，即使他曾經靠洗盤子為生，而且從來不炫學（“pretensions to intellectualism”），依然被批評為「說話的方式像是知識分子」（270），遭輕蔑以對，以致主角無法理解他們「普羅階級的優越感」（292）。<sup>28</sup>

為了達到他的目標，主角的作法在於結合不同族裔的人士，從實際的經驗出發，並質疑所謂的知識分子或專業人士，這也類似葛蘭西所批判的正統的專家（experts in legitimation）。卜婁杉曾在書信中寫道：

我從經驗寫作，因為我有幸和美國各個種族的人一塊生活、工作、奮鬥。只知道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只和他們一塊生活、工作、奮鬥，是悲慘的。他們這類人有別於群眾：他們錢包的大小是真正的障礙，而且這兩個階級無法妥協於共同持久的目標。（Bulosan, 1979: 153）

此處的夫子自道正說明了卜婁杉與工人階級、不同族裔結合，從經驗出發的取向。<sup>29</sup> 而他在一篇自述中對於自己身為作家的「唯一責任」，

<sup>28</sup> 有趣的是，對卜婁杉鑽研最深的聖·璜在有關種族歧視的著作中，直言他是「偉大的革命普羅作家」（“the great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n writer”）（San Juan, 2002: 196）。

<sup>29</sup> 這個取向形塑了他的文學價值，因此他以「唯物的觀點來解釋我們的文化成長」，對於類似維雅（José Garcia Villa）者流的作家不以為然，認為他所代表的是「文化到達巔峰之後的衰退」，而「不能代表我們的文學的成長」，所以「在談到文學作為持續的傳統，一個成長的文化運動時，維雅就顯得時地不宜了」（Bulosan, 1979: 153）。

有如下的表白：「什麼激勵我寫作？答案是——我有關人類平等和全民自由的大夢。為在美國、夏威夷、阿拉斯加十萬名無聲的菲律賓人，賦予文字的聲音。最重要的是，以和當代歷史相關的方式，來轉化菲律賓與海外所有菲律賓人的欲望和期盼」(Bulosan, 1995a: 216)。簡言之，對卜婁杉而言，文學、文化與啓蒙、反抗暴虐、淑世／贖世息息相關。在這種體認下所寫出的《美國在我心》，正如聖·璜所言，見證了卜婁杉寄望於「社會主義的人文主義的力量 (the power of socialist humanism)」，因為「這種人文主義刻畫了工人階級的集體奮鬥以及各地被壓迫的民族反帝的民族主義。」因此，在聖·璜心目中，這本書「再次肯定了團結、戰鬥性的激進主義和自我犧牲的理念，這些理念使得他的詩、故事、書信與散文具有活力。它紀念了菲律賓人藉著反抗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提升自我覺知，並接受他們的歷史任務」(San Juan, 1972: 93)。尤有甚者，此書呈現出作家／知識分子抒發義憤、為民喉舌、以文字與行動來見證和改造的重要角色，其意義不只限於一時一地，而是具有普世價值，否則也不會在異時異地打動許多讀者。這正驗證了薩依德所主張的，「作家身為知識分子的特殊象徵角色，是在見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驗，因而賦予那個經驗一個公共身分，銘刻於全球的論述議程裡」(Said, 2004: 127)。

---

151)。而從卜婁杉對黎剎的推崇，有心為他立傳，將他置於菲律賓文學與歷史的脈絡，便可看出他的立場。此外，加馬林達 (Eric Gamalinda) 在一九九六年編輯、出版的菲裔美國作家文選的序言提到，卜婁杉和維雅是可見度最高的兩位，卜婁杉的作品「時至今日仍有其效用與相關性，提醒在他的國家和美國未曾改變的狀況」，至於波希米亞式的維雅，手法富有實驗性，無法定位於「特定的地理」，因此文選中取前者而棄後者 (4)。

## 陸、結論：文學、希望與再現／再生

由上述可知，《美國在我心》於亞美文學傳統中的特殊地位與意義，因為作者卜婁杉不但來自美國前殖民地，而且以階級的議題貫穿全書，並結合族裔的因素。正如聖·璜所指出的，「只有藉著在思想和行動上與自己的階級／民族重新整合，並在充滿衝突的領域裡建立起由一己特定的疏離所產生的根源與花朵，卜婁杉才能掌握身為在美國的菲律賓人的歷史存在之多面向整體」(San Juan, 1995: 4)，其作品才成為在美國的「菲律賓人經驗的典範」(25)。書中披露了階級意識與抗爭心態，以及主角採取寫作、發行刊物、組織工會等具體措施進行鬥爭，以期建立一個更公平、正義、合理、非高壓、非暴虐的社會，進而以文字寫下這一切。他對美國夢的堅持以及對美國現實面的強力抨擊，凸顯了美國社會背離建國時的理想，使原先的應許之地淪為不公不義的泥淖。他的力量也許在一時之間顯得微弱，但藉由書寫自己的經驗與感受，為階級和族裔作見證，也為自己追求公理正義的努力留下紀錄，結果則是「(a) 透過寫實主義的文學，表達了人們盼望免於匱乏和恐懼，(b) 透過革命的文學，表達了人們奮鬥以求擺脫經濟和政治的箝制，(c) 透過希望和成長的文學，表達了人們在殖民主義下非人的經驗」(Orendain, 1988: 367)。

從此書的實例可以看出，閱讀和寫作不但賦予自己力量(self-empowerment)，也賦予他人力量。對主角來說，由原先如喪家之犬般悽悽惶惶四處竄逃，無力感、憎恨、憤怒一再累積，由恐懼、逃亡，而訴諸反擊與暴力（書中數處有關暴力的描述令人怵目驚心），以「投入的、激進的想像力」(“the committed radical imagination”) (San Juan, 1979: 27)，轉換成具有創造性的寫作，不但將原先的遭遇以及由之產生的恐懼、憎恨、憤怒化為寫作的資源和動力，並且



藉此銘刻下個人的遭逢與族裔、階級的共同苦難，對抗麻木、墮落與遺忘，保留了皮諾依血淚斑斑的集體經驗與記憶。而寫作讓人在文字裡復活，不但是他年輕時的志願 (57)，也是兄長阿馬多於入伍前，面臨未卜的前途時對他的信心 (322)，事實證明果然如此。因此，《美國在我心》被視為菲美／亞美文學的經典著作，其來有自。

## 參考文獻

- 馮品佳 (2002)。〈台灣地區的新英文文學及美國弱勢族裔文學研究〉。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計畫成果，16 頁。未出版。
- 單德興 (2001)。〈冒現的文學／研究：台灣的亞美文學研究——兼論美國原住民文學研究〉，《中外文學》，29, 11 (4 月)：11-28。
- Alquizola, M. (1989). The fictive narrator of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In G. M. Nomura et al. (Eds.), *Frontiers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Writing,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pp. 211-217). Pullman, WA: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Alquizola, M. (1991). Subversion or affirmation: The text and subtext of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In S. Hune et al. (Eds.), *Asian Americans: Comparative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pp. 199-209). Pullman, WA: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arrera, M. (1979). *Race and class in the Southwest: A the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Bonus, R. (2000). *Locating Filipino Americans: Ethnic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pa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ulosan, C. (Ed.). (1934, Oct.-Nov.). *The New Tide*, 1.
- Bulosan, C. (Ed.). (1942). *Chorus for America: Six Philippine poets*. Los Angeles: Wagon and Star.
- Bulosan, C. (Ed.). (1952). *1952 yearbook, cannery workers, ILWU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 Warehousemen's Union] Local 37*. Seattle: Local 37, ILWU.
- Bulosan, C. (1960). *Sound of falling light: Letters in exile* (D. S. Feria, Ed.).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 Bulosan, C. (1973).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A personal history* (C. McWilliams, Intro.).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3)
- Bulosan, C. (1979). Selected letters of Carlos Bulosan: 1937-1955. *Amerasia Journal*, 6, 1: 143-154.
- Bulosan, C. (1995a).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In E. San Juan, Jr.

- (Ed. & Intro.), *On becoming Filipino: Selected writings of Carlos Bulosan* (pp. 215-216).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ulosan, C. (1995b). The growth of Philippine culture. In E. San Juan, Jr. (Ed. & Intro.), *On becoming Filipino: Selected writings of Carlos Bulosan* (pp. 115-123).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ulosan, C. (1995c). How my stories were written. In E. San Juan, Jr. (Ed. & Intro.), *On becoming Filipino: Selected writings of Carlos Bulosan* (pp. 109-11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ulosan, C. (1995d). The writer as worker. In E. San Juan, Jr. (Ed. & Intro.), *On becoming Filipino: Selected writings of Carlos Bulosan* (pp. 143-14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ulosan, C. (1996). All the living fear. In L. H. Francia & E. Gamalinda (Eds.), *Flippin': Filipinos on America* (pp. 219-220). New York: Asian American Writers' Workshop.
- Campomanes, O. V. (1992). Filipino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literature of exile. In S. G.-L. Lim & A. Ling (Eds.),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 (pp. 49-78).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Campomanes, O. V., & Gernes, T. S. (1988). Two letters from America: Carlos Bulosan and the act of writing. *MELUS*, 15, 3: 15-46.
- Chow, C. (1979). A brother reflects: An interview with Aurelio Bulosan. *Amerasia Journal*, 6, 1: 155-166.
- Chu, P. P. (2000). *Assimilating Asians: Gendered strategies of authorship in Asian America*.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eWitt, H. A. (1980). *Violence in the fields: California Filipino farm labor unionization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Saratoga, CA: Century Twenty One Publishing.
- Evangelista, S. (1980). Carlos Bulosan: A socio-historical biography.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view*, 44:

- 243-266.
- Evangelista, S. (1985). *Carlos Bulosan and his poetry: A biography and anthology*.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Gamalinda, E. (1996). Myth, memory, myopia: Or, I may be brown but I hear America singin'. In L. H. Francia & E. Gamalinda (Eds.), *Flippin': Filipinos on America* (pp. 1-5). New York: Asian American Writers' Workshop.
- Gier, J. V. (1995). ". . . to have come from someplace": *October light,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and "Flip" writing after the Third World Strikes. *Critical Mass: A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2, 2: 1-33.
- Gonzalez, N. V. M., & Campomanes, O. V. (1997). Filipino American literature. In K.-K. Cheung (Ed.), *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pp. 62-124).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Q. Hoare & G. N. Smith, Eds. &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 Gramsci, A. (1988). *An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D. Forgacs, E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Houn, F. W.-H. (1986-87). Review. *Amerasia Journal*, 13, 1: 187-189.
- Jaskoski, H. (1996). Carlos Bulosan's literary debt to Richard Wright. In T. Mishkin (Ed.), *Literary influence and African-American writers* (pp. 231-243). New York: Garland.
- Kim, E. H. (1982).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ee, R. C. (1999). *The Americas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Gendered fictions of nation and trans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bretti, T. (2001).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by Carlos Bulosan. In S.-L. C. Wong & S. H. Sumida (Eds.), *A resource guide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pp. 21-31). New York: MLA.

- McWilliams, C. (1973). Introduction. In C. Bulosan,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A personal history* (pp. vii-xxiv).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orante, P. C. (1984). *Remembering Carlos Bulosan (His heart affair with Americ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New Day.
- Mostern, K. (1995). What is America in the heart? *Critical Mass: A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2, 2: 35-65.
- Nguyen, V. T. (2002). *Race and resistanc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Asian America*. Oxford, UK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endain, M. R. (1988).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ird World writing in Bulosan's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Saint Louis University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SLRJ)*, 19, 2: 365-375.
- Penaranda, O., Syquia, S., & Tagatac, S. (1974). An introduction to Filipino-American literature. In F. Chin, J. P. Chan, L. F. Inada, & S. Wong (Eds.), *Aiii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pp. 37-54).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aid, E. W. (2004). The public role of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In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pp. 119-1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an Juan, E., Jr. (1971). *The radical tradition in Philippine literature*.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Manlapaz Publishing.
- San Juan, E., Jr. (1972). *Carlos Bulosa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lass struggle*.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 San Juan, E., Jr. (1978). Introduction. In C. Bulosan, *The Philippines is in the heart* (pp. vi-x).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New Day.
- San Juan, E., Jr. (1979). Introduction. *Amerasia Journal*, 6, 1: 3-29.
- San Juan, E., Jr. (1993). Filipino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Re-

- claiming whose America? *Philippine Studies*, 41: 141-166.
- San Juan, E., Jr. (1995). Introduction. In E. San Juan, Jr. (Ed.), *On becoming Filipino: Selected writings of Carlos Bulosan* (pp. 1-4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an Juan, E., Jr. (1996). Violence of exile, politics of desire: Prologue to Carlos Bulosan. In *The Philippine temptation: Dialectics of Philippines-U.S. literary relations* (pp. 129-17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an Juan, E., Jr. (1998). Bulosan's metamorphosis: The return of the alter/native. In *From exile to diaspora: Versions of the Filipino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95-131).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San Juan, E., Jr. (2000). *After postcolonialism: Remapping Philippines-United States confrontation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San Juan, E., Jr. (2002). *Rac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Critiques of multiculturalist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an Juan, E., Jr. (Ed. & Intro.). (1995). *On becoming Filipino: Selected writings of Carlos Bulos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han, T.-H. (2001, July 12-13). Transcultural encounters and translingual performances: When Fa Mu Lan and Lo Bun Sun meet Hwa Mulan and Robinson Cruso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ransculturalis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aipei,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 Solberg, S. E. (1979). Carlos Bulosan: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Amerasia Journal*, 6, 1: 167-172.
- Solberg, S. E. (1983). An introduction to Filipino American literature. In F. Chin, J. P. Chan, L. F. Inada, & S. Wong (Eds.), *Aiii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pp. 39-58).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 Solberg, S. E. (1999). First-generation writings: Younghill Kang and Carlos Bulosan. In G. J. Leonard (Ed.), *The Asian Pacific*

- American heritage: A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arts* (pp. 423-425).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 Trudeau, L. J. (1999). Carlos Bulosan. In L. J. Trudeau (E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Reviews and criticism of works by American writers of Asian descent* (pp. 1-16). Detroit & London: Gale.
- Wong, S.-L. C. (1993).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ng, S.-L. C., & Sumida, S. H. (Eds). (2001). *A resource guide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MLA.

**Class, Ethnicity, and Representation—  
Reading Carlos Bulosan's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Te-hsing Shan*

**Abstract**

This 6-part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representational strategies and important issues in Carlos Bulosan's *American Is in the Hear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lass and ethnicity. Part 1 describes the multiple roles that this Filipino American writer played; part 2 reveals that class is the very issue that links the whole novel; part 3 analyzes how class and ethnicity join to form "the colonized class segment"; part 4 investigates how the protagonist made use of the mainstream values he had internalized to fight against the injustice imposed upon the immigrant laborers by mainstream White society; part 5 highlights the protagonist's role as a writer and intellectual; and part 6 shows how literature brings about hope and regeneration through representation.

**Key Words:** Carlos Bulosan,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Class, Ethnicity,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